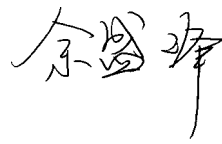


革命恐懼的幻象



近十年來，中國進入一個錯綜複雜的歷史時期，知識界的光譜愈趨混雜。如果說，1980年代以降新啟蒙主義是思想界的標竿，那麼，近年來所浮現的革命—保守論爭則代表思想譜系的重新組合。自由主義和新左翼作為前一個十年思想界的劃分標準，已經趨於淡化。這意味，在思想標尺上，從原先圍繞於啟蒙這一原點的左右調整，思想界開始趨向於兩端張力的加強，這與社會情緒積聚的格局大致相符。

1989年之後，經濟增長成為唯一的和解選項。在政治改革希望幻滅的情形下，中共主張維持改革的漸進結構，希望通過它，迂迴到達那個半途夭折的政治運動的最終目的地。這形成一種怪異的歷史局面：改革是為杜絕保守勢力重登舞台，而支持改革又必須抑制「激進主義」的重生。「告別革命」是改革自我確證的方式，而對保守勢力的抵制，又以保守主義的姿態完成。這可以解釋1990年代以降那些看似矛盾的「新權威主義」、「新保守主義」、「自由主義」、「市場激進主義」思潮的交替出現。

利益衝突一旦到達一定程度，就會以觀念重組的方式展現，近年來的思潮演變正是其反映。某種程度來說，自由主義和新左翼是圍繞市場機制展開的討論，而保守與革命之爭則代表政治危機的加劇。

利益衝突一旦到達一定程度，就會以觀念重組的方式展現，近年來的思潮演變正是其反映。某種程度來說，1990年代的自由主義和新左翼是圍繞市場機制展開的討論，而近年來保守與革命之爭則代表政治危機的加劇。

一 精英活力與國家—精英—民眾三角結構的消失

這個時代的主要癥結表面上是精英的分歧，黨政精英控制着經濟和知識精英的進階之道，經濟精英鄙視知識精英的學院氣，而知識精英在獨立和依附之間搖擺不定。在精英之間，尋找不到一個主要的中樞、支持的重點。但分歧本身並不意味活力的喪失，比分歧更為嚴重的是，潛藏在這種分歧之下的，其實是不同的領域精英相互對抗能力的喪失，這比精英集團的精神敗壞更具有危險性。1990年代中期以來，體制內的黨政—經濟精英集團獲得壟斷性支配地位，在這之前的市場化過程中催生的經濟新貴以及各領域的知識精英，都在這一壓倒性的支配力量面前喪失獨立性。1990年代中期之前，那個剛剛展開的精英多

元化趨勢戛然而止。所有領域的精英份子開始不同程度地依附於由黨政—經濟精英群體所把控的通道，以及由它所支持的一整套政治說辭。儘管多數領域的流動性還在加強，但這無法掩蓋整個精英集團的固化、頹怠的趨勢。

經濟精英身處的不再是自由競爭的市場結構，教育、科研、媒體領域的知識精英在體制的中心與邊緣之間掙扎，體制外精英面對權力和資本的包圍更是陷於困頓。獨立性的喪失，意味着批判力的下降。表面的流動性，難以阻止精英群體的同化與依附化。精英內部張力的喪失，實際也意味其動員和控制民眾能力的下降，這是加強維穩機制背後的根源。金錢綏靖和暴力手段的需求隨之而上升。對於精英群體，民眾的不信任是普遍的。作為整體的精英集團，難以再與它所在之外的社會階層形成互動和對話，精英更多關注自己的小團體利益。他們寧願說服自己相信，自由只來自那些具體細微的環節，民主的真諦在於「羅伯特議事規則」(Robert's Rules of Order)。他們的訴求，無法與那些境遇糟糕的階層發生聯繫。在這種情況下，保守與革命的衝突也就被誇大，作為一種假想的威脅和恐嚇，以此避免變革對精英群體所可能帶來的地位搖動。

正是精英的對抗和制衡，才是精英掌握大眾的秘密。革命與保守之爭，其實更多是喪失活力的精英集團營造出來的幻象。這些精英抱有穩定秩序、推動改革的某種真誠，卻希望壓制那些不同於他們的聲音，這進一步加劇了政治危機的累積。

面對這種危機，人們徒勞地希望尋求精英的共識與團結，孰不知，正是精英的對抗和制衡，才是精英掌握大眾的秘密。黨政精英希望通過建造一座堅固的精英金字塔，以此應付那個由他們釋放出來的魔鬼——改革的訴求所可能催發的未知因素。但是，由此所導致的精英集團張力的喪失，實際也意味作為整體的精英集團的權威性和吸引力的下降。精英和民眾成為兩個國度中相互觀望的陌生國民。在這種情形下，即使是對權力充滿了不滿情緒的精英，也同樣表現出對「多數人暴政」的深刻敵視。革命與保守之爭，其實更多是喪失活力的精英集團營造出來的幻象。這些精英抱有穩定秩序、推動改革的某種真誠，卻希望壓制那些不同於他們的聲音，這進一步加劇了政治危機的累積。

在改革的黃金時期，國家、精英群體與社會大眾之間存在一種隱性的默契關係，這種三角張力的消失，是精英集團活力喪失的表現。這不僅是精英群體倫理危機的體現，也預示了政治危機的逼近。迅速膨脹的民眾訴求難以獲得機制性的疏導，穩定的假象建立在一種誰都可以嘲弄幾句的社會現實之上，這是洪水衝破壩基之前那種可怕的氛圍。在這種結構之下，社會運動的成果也往往是零碎的、偶然的、短暫的、脆弱的，沒有人可以保證它的穩定和持續，因為沒有一種結構能讓這種力量獲得一個穩定的生長環境。

單純的利益只能為精英集團帶來爭鬥。改革初期所建立的利益同盟就建立在某種價值共識之上；過去很長時間的政治穩定，也建立在國家、精英與民眾之間的價值默契之上。但這一同盟並未維持太久。城鄉之間、央地之間、部門之間、階層之間，在所有這些利益的中心，都出現價值共識的裂縫。利益上的均沾一旦打破，利益的天秤一旦過度失衡，價值觀念上的衝突就會迅速出現。即使人們依然在使用舊日的修辭，但這無法阻止利益重組過程中的觀念蛻變。那些在利益重組中被甩出去的舊精英份子，也會開始打上草根的旗號；某些既得利益者也不時利用這些觀念，以維持他們的思想吸引力。但是，在如何有效動員民眾方面，他們一樣都表現蹩腳，充滿了各種言不及物的空洞的精英腔調，民眾對此的回應也當然只是試探性的。

某種程度上，精英群體已淪為「寄生階層」。它一方面享受各種特權，另一方面又極力避免陷入孤立，讓自己寄生在對民眾的不斷靠近之中。精英必須巧妙地在那種疏離和靠近之間尋找到一種平衡。在公共媒體中，精英群體也經常機巧地迎合民眾的激情與欲望，用無關痛癢的頌詞或是隔靴搔癢的批評，製造「扭曲的公共領域」，讓人們淪為「喧嘩的大多數」。健康的公共領域需要「普遍性」的精英公民作為擔綱者，但在當下，所有階層都在拼命展示自己的「特殊性」，到處都呈現出「自我剝奪」的怪象：上層精英的心態是布爾喬亞式的，中產階級沉浸在貓狗世界之中，下層民眾則自嘲為「屌絲」群體。在這樣一種「探底競爭」(race to the bottom) 的身份遊戲中，安全和幸福取決於誰更加成功地為自己打造出一套比實際身份更低的偽裝。

關於革命與保守的爭論，在當下其實不過是關於民主的表態。過去幾十年，精英群體對於改革歷史的壟斷，使整個公共領域出現一種新的「封建化」趨勢，批判聲音的存在無法掩蓋社會空間的收縮和政治生態的惡化。在當下的氛圍裏，那些保守姿態的重現，就不只是對於革命的恐懼那麼簡單，而也來自對政治的深沉恐懼。去政治化與泛政治化的並存並不矛盾，如同去道德化和泛道德化並存一樣，相互的轉換往往只要一瞬間就能完成。

二 保守與革命的協奏曲

毛澤東時代是革命的時代，鄧小平時代是保守的時代。容易被忽視的，此刻不再是革命和保守其中之一的興起，而是二者的同時出現。這是建國以來全新的歷史現象。一個多世紀的時間裏，只有晚清的政治氣氛與之相似。革命與保守相互激蕩，正是大風暴來臨的徵兆。保守與革命所演繹的不再是變奏曲，而毋寧是一首協奏曲。這對應於近十年來中國社會結構的複雜化，特別是利益兩極分化的趨勢。1980年代啟蒙話語下的左右之爭，多少是市場改革的觀念反映；但對於當時社會地層暗湧的熔漿，思想界則顯隔膜。革命和保守是對傳統左右之爭的反彈，但也無法切中時代危機的本質，更多只是情緒性的反應。革命與保守部分複製了社會矛盾的分裂線，又掩蓋了正在集聚的力量真實性。人們接觸到了，卻視而不見。

與1789年法國大革命前夜一樣，當下中國精英群體既無力提供變革的方向，又無法把握政治變革的主動權。社會鉅變搖動了民眾沉睡的政治意識，但舊精英群體卻又產生普遍的犬儒情緒。它享受貴族的特權，卻不承擔精英的責任，在某種意義上，又成為玩弄觀念和利益的「寄生蟲」。特別是，中國在經濟上的迅速崛起更是給它以自信，所有的異議因此遭遇解構——既然所有這些成果都來自反對「革命激進」的改革實踐。這種半認真的「樂觀漸進主義」滲透在諸多話語之中。

1980年代啟動的改革，包括政治、經濟、法律各領域的大幅調整，主要是在黨政精英和體制外精英的合力之下，在相對封閉的權力空間推動完成的。新啟蒙主義者表面上的對抗性，無法掩蓋他們作為精英同盟的實質，「以批評的聲

毛澤東時代是革命的時代，鄧小平時代是保守的時代。此刻不再是革命和保守其中之一的興起，而是二者的同時出現。革命與保守相互激蕩，正是大風暴來臨的徵兆。這對應於近十年來中國社會結構的複雜化，特別是利益兩極分化的趨勢。

音促成建設」。這一由新舊精英主導的政治過程，全權代表民眾的利益與觀念，這一互有默契的授權—代表格局直至新世紀之前，都沒有受到衝擊，有的只是局部調整，比如知識精英的半邊緣化和經濟精英的崛起。在這段歷史時間裏，幾乎所有領域的精英都沒有試圖把握普通民眾的思維及其變化。黨政精英、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都習慣了在一個封閉的權力結構裏壟斷政治的解釋權，他們不斷製造出新的分化，又以表面上變動不居的流動性掩飾社會的裂縫。社會分化無疑帶來了集體行動的困難，這也給予既得利益群體壓制變革的動機。不過，當一個面目全非的巨人開始蹣跚走上舞台，舞台上的所有人都都陷入了無所適從之中。

精英與民眾這種刻意維持的超脫和距離，是經濟奇迹的保證，由此形成的冷漠氛圍，則有助一個無需協商就逐漸鞏固的隱性同盟的出現。過去幾十年，精英群體已經習慣於將民眾視為被動的政治力量，對它來說，民眾不過是抽象的存在。即使精英對於民眾具體的苦難不乏同情，但是，善良並不容許深入的思考，他們的善良需要讓自身保持在安全的狀態，這一切都被歸結為「過渡階段」必要的痛苦和犧牲。改革時代塑造的冷硬心態，尤其能夠替代懺悔的需要。在這樣一個時代，敏感的心靈是最為常見的祭品。

隨着改革效應的持續耗散，失意群體與精英的身份意識愈發對立，改革初期的共識基礎不斷瓦解。1989年就已現端倪的精英與民眾的隔離更加嚴重，鴻溝還在繼續擴大。伴隨新啟蒙主義者1990年代以降批判力的逐漸喪失，精英集團的內部張力也趨於鬆弛，精英批判能力的喪失與精英集團共識的分裂同時發生。近十年以來，新舊精英逐步完成了體制化的進程，遁入各自封閉一統的小天地之中。這個體制化的過程，彌合了共識分裂所帶來的不適，「改革政治」提供了讓一切問題留待時間解決的假象。

利益兩極分化帶來的不是兩個對立的階級，它只不過是以激烈的方式展現分裂。與底層群體相比，精英群體更像散落一地的馬鈴薯。精英群體的一致性純粹消極的，只希望獲益而不允許有所受損。改革時期形成了一座以風險階序分化為設計原則的金字塔，它的底座嵌在底層民眾的身體之上。「民粹激進主義」這些說辭透射出精英的自負，在這一點上，知識精英並不比黨政精英好多少。政治不只是不准談論的禁忌，也成為一塊不可染指的神秘禁地。這形成一種奇怪的沉默合謀，表面熱鬧的公共討論無法掩蓋實質的空洞，愈是喧囂愈是寂靜。精英群體的三心二意，正是其整體疲怠的體現。讓自己保持在安逸的狀態，依賴於將問題複雜化，以及在絕對和相對辯證法中游刃有餘的能力。社會抗爭被來自不同方向的勢力壓制，而這些勢力彼此之間也都看不順眼。在這裏，終於形成了一種奇特的「兩個中國」的怪異景象。

一個中國無法理解另一個中國。用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的話說，人們原先就自我閉塞，現在則彼此孤立；人們原先就彼此凜若冰霜，現在則凍結成冰。「兩個中國」有其各自的深層危機，而各自的危機又以相互激蕩的方式提升整體危機的烈度。這顯示出一種普遍的矛盾：精英對於危機的回應，既有可能採取保守姿態，也有可能訴諸革命激情；草根民眾對於挫折的回應，既可能呼籲自由與民主，也可能寄託於不同革命神像的公平訴求。

隨着改革效應持續耗散，失意群體與精英的身份意識愈發對立，改革初期的共識基礎不斷瓦解。1989年就已現端倪的精英與民眾的隔離更加嚴重，伴隨新啟蒙主義者1990年代以降批判力的逐漸喪失，精英集團的內部張力也趨於鬆弛。

作為個體，人們也傾向於將這種矛盾複製在自己身上：同時承認革命和保守的必要性，這種有所出擊又迅速退縮的姿態荒謬而又現實。體現在公共的精神生活，則是意識形態穿幫與自我審查慣習的並存。公共批判經常變成了教條和口號。這實際也源於整體生存狀況的內在荒謬——前後不一致卻又自成一體——這是存在的悖論，人們也以這種悖論方式對抗整個時代的虛無。無所不在的普遍不滿和無所不在的普遍滿意，正源於這種矛盾的滲透和延伸。但無論如何，在發展中解決一切以及「過渡階段」的神話看來逐漸破滅了，在這個社會中，沒有甚麼東西再可以固定不變。

三 民眾反抗的武器

中國的農民和工人都發現自己的命運正面臨戲劇性的變化，不僅改革的舉措與他們的想像相異，而且，作為曾經的革命者同盟，他們的命運都在殘酷的競爭中遭遇各種悲劇性的翻轉。底層民眾無法發出聲音，在經濟發展中，工人只是被動員、流水線操作、勞動力資源，作為稅收、工業產值、資本利潤的統計數據而存在。他們不是沒有抗議的衝動，只是他們的表達難以獲得公共性。從這種無奈的沉默中，精英集團卻認為自己已取得他們的同意。

在多數情形下，底層民眾只能利用一些沒有多大風險的「弱者的武器」，這不需要事先的協調或計劃，只需利用心照不宣的默會和非正式的網絡，採取一些分散的抗爭形式。由於工人日常經歷、身處其中的是具體的工廠、流水線的快節奏、巨型的辦公大樓，接觸到的是嚴厲無情的保安、唯利是圖的資產所有者，因而，他們是在一個個具體的環境中遭到剝奪和排除。他們難以為那些宏大而抽象的目標而努力，也不會將不滿歸諸抽象的體制。相反，他們可能只會慶幸得到就業保障、福利措施和升職加薪的希望。只是，由於這一體制與正義理念的內在衝突，他們的不滿最終還將導向一種必然的反抗，那時就不再只是針對特定目標的抱怨，也不僅只是日常的抵抗。過去所看到的緩慢的、瑣碎的、平靜的反抗，以及人們遵從和聽話的表象、悄無聲息的磨工拖延，因其瑣屑而被長期忽視；但是，一旦出現某種爆發的信號，它只能表明，常規的和大量隱秘的反抗已經失效，此時，某種可能引發致命風險的抗爭，將會在不同地區經過長時間的醞釀後最終來臨。

美國政治人類學家斯科特 (James C. Scott) 曾發現，一個統治體系的主要功能在於界定甚麼是現實的、甚麼是不現實的，並且將某些目標和渴望歸入決無可能、白日做夢、痴心妄想的範圍。謀生的現實需要，可能會暫時讓某些群體毫無保留地接受現狀，但這不能因此否定，在人們的內心還會保留正義社會的想像。現代的統治觸角，已然滲透到社會神經的最末端，從物質到精神的層面，一整套現代的治理體系和話語體系，已經比過去更有效地實現控制。但是，現代社會也已決定性地開啟了每個個體內心質疑和對抗的大門。在統治體系運用現代技術（審查、監控）更為有效地控制外部生活的同時，也遺漏了由每個

中國的農民和工人的命運正面臨戲劇性的變化，不僅改革的舉措與他們的想像相異，而且，作為曾經的革命者同盟，他們的命運都在殘酷的競爭中遭遇各種悲劇性的翻轉。底層民眾無法發出聲音，精英集團卻認為自己已取得他們的同意。

個體內心騷動不安所連接的巨大空間。改革時期實際已不斷塑造出新的社會空間，這一社會空間仍在重組和變動之中；而且，伴隨媒體技術的新型革命，它將進一步突破舊有的社會運動及其動員方式，我們只能確定未來的高度不確定性。

設想一種人為控制的體制安排，希望以此來分配和主導各個階層的生活，以至於，以為自此可以消解那些被束縛壓抑的領域的自主、反抗的能力，這只是一種盲目的自信。既有的安排既然遺留了某些自主的領域，那麼即使是一種具有超強控制能力的統治體系，也終將難以壟斷有關「現實」與「未來」的想像。

最為愚蠢的信條是，希望將自己主導的領域宣布為「自由」與「自然」的勝利，與此同時，臆測那些被它宣布為「激進」的領域目前的沉默狀況將是永遠沉默的標誌。這種信條必然破產的命運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在一個自由多少已經擴展起來的社會，不管黨政精英集團有多麼強烈的意願要將政治秩序按照自己的意志包裹起來，它總會惱怒地發現，自己正在面臨一些革命性的，或是悄無聲息의思想和行動。它將在這種無法全面遏制的狀況面前，意識到自己宣稱的「自然法則」的界限所在，同時發現根本無法從鎮壓某些否定的行動那裏伸張自己的意志。雖然行動容易控制，但否定思想無處不在。它最終將會發現，意圖控制思想是完全徒勞的。在徹底的挫敗面前，它將最終把槍口對準自己。

道德話語一旦轉化為公共話語，也就成為弱勢群體對抗強勢群體的思想武器，弱勢群體可以在這些話語裏獲取使它們的主張、要求和行動正當化的空間，而官方精英意識形態就必須不斷作出新的詮釋來回應這些要求。對一個當權的社會主義政黨來說，最危險的敵人來自它的歷史承諾。作為一個曾經作出過革命道德承諾的執政黨，在如何繼承其革命承諾的問題上最為棘手。現實需要某些群體作出犧牲，因而也特別需要對革命的承諾加以道德上的強化，但這又面臨與眼前實際的承諾弱化產生衝突。這種革命承諾的困境可能是終極性的。

四 結語

保守與革命之爭反映的是致命的自負：它希望由精英集團壟斷政治，大眾作為沉默的被代表者，由精英代理人代替他們參與政治。這種人為固化的二元格局只會繼續固化政治危機，這種脆弱的精英寡頭格局勢必難以為繼。根本而言，民主運動是抵抗這一僵化的利益同盟的唯一方式。在這種意義上，「革命」就是要求進入那些被支配的陣地，要求創造一種新的國家、精英與民眾相互抗衡的張力空間。在此過程中，各種力量與勢力將以不同方式形成新的組合，革命浪漫心智將在實際的鬥爭中逐漸成熟。把一切形式的動員，把民眾的參與要求，把對一切壓抑與統治的反抗，都一股腦兒歸結為「革命的激進」，這與來自統治者蠻橫的壓制沒有本質的區別。

保守與革命之爭反映的是致命的自負：它希望由精英壟斷政治，大眾作為沉默的被代表者，由精英代理人代替他們參與政治。這種人為固化的二元格局只會繼續固化政治危機，這種脆弱的精英寡頭格局勢必難以為繼。民主運動是抵抗這一僵化的利益同盟的唯一方式。